

# 论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陈衍德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的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口岸中, 厦门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 “同外贸相比, 对厦门城市发展影响更大的是厦门及福建南部持续不断的向海外移民”。其次, 厦门是“东南沿海城市中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商业城市”。<sup>①</sup>而后者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 因为侨汇及华侨出入国与消费生活之间、华侨投资与城市建设及工商业之间, 都有极大的相关性。因此, 如果没有华侨这一因素, 近代厦门的经济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将是很难想象的。过去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方面, 而本文将注重华侨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经济生活是由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组成的, 因而本文将注意从宏观上把握华侨对经济生活诸领域的综合影响。至于为什么选择民国时期的厦门作为研究对象, 那是因为这一时期是华侨在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时期, 尤其是抗战前的十几年当中。

## 一、华侨在民国时期厦门消费生活中的作用

消费是经济生活诸环节的终点, 又是其起点,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和交换, 前者对后二者起着促进或阻滞的作用。由于近代厦门是中国最大的华侨出入口岸之一, 过往的华侨在厦门有着庞大的消费; 又由于华侨资金的流入以侨汇(华侨用以赡养国内亲属的汇款)为最主要形式, 而厦门又是侨汇主要汇入地之一, 所以华侨对厦门消费生活的影响, 实超过对其它经济领域的影响。这也是近代厦门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商业城市的主要原因。

必要消费是城乡居民维持生活的基本消费, 因而华侨对厦门居民必要消费的影响, 最能说明华侨在厦门消费生活中的作用。厦门居民中有一部分为华侨眷属(侨眷)和回国定居的原华侨(归侨), 他们的生活主要靠侨汇, 侨汇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据1957年的统计数字, 厦门市有侨眷、归侨4万人, 占本市居民总数的13.47%。<sup>②</sup>民国时期虽无此类统计数字, 但据其它数据, 再参考上述1957年的数据, 可推测一个大概。据1922—1931年的厦门海关十年报告, 192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 厦门及附近地区人口超过473000人, 仅厦门市内就有128000人。<sup>③</sup>若当时厦门行政区划内总人口在236500人至256000人之间的话(各按前两个数字的1/2和2倍推算出), 则按保守的10%计算, 1920年代后期厦门的归侨、侨眷大致在23650人至25600人之间。据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一书中的资料, 1927—38年间, 厦门华侨汇款年均为1608万美元,<sup>④</sup>按上述1920年代后期厦门归侨、侨眷人口推算出其户数为47300户至51200户(每户以五口计), 则每户每年平均收到侨汇约为314美元至340美元。又据笔者对厦门市郊12

个自然村的调查,民国时期每户菲律宾华侨的眷属每月收到的侨汇,少者为20—30银元(约当5.9—8.85美元),多者为200—300银元(约当59—88.5美元)。<sup>⑤</sup>据此则菲华侨眷属每户年均收到侨汇为486.75美元,高于上述平均数。但因菲律宾华侨汇款是最多的,其余新、马、印尼等地华侨汇款仅约当其2/3,<sup>⑥</sup>所以总的来说314—340美元的户年均侨汇收入数额是适中的。

由于侨汇的缘故,侨眷的生活水平便高于一般居民,因为“侨汇使用主要是消费性的”。<sup>⑦</sup>据陈达于1930年代对闽南和粤东侨乡的调查,非华侨家庭和华侨家庭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5.13%和60.09%,而后者用于食品消费的开支是前者的2.5倍以上。<sup>⑧</sup>这说明侨眷的生活水平高于一般人,亦即其消费能力高于一般人,从而其对消费经济的影响力也大于一般人。换言之,其人均(或户均)消费高于一般人,因而其消费的变动也就会对整个消费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民国时期厦门绸布的销路,随着侨汇的增减所导致的侨眷消费力的升降而波动,抗战期间“厦门绸布商业遭到很大困难”,“侨汇断绝是导致市场衰落的重要原因”。<sup>⑨</sup>所以,通过侨眷的消费所表现出来的华侨对厦门消费生活的作用,是至为明显的。

华侨频繁出入厦门口岸,也是影响厦门消费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除了抗战时期,厦门是福建省华侨唯一的出入口岸。闽南各地华侨回乡经过厦门时,都要在厦门购买各种物品以馈赠亲友;返回海外居住地时,又要在厦门采购其所需物品。这样一进一出,就极大地扩充了厦门的消费品市场。仍以绸布业为例,民国时期厦门绸布业零售商经营的主要对象除了侨眷以外,就是过往华侨这一流动人口群。据1950年代的调查,在民国时期的正常年代,厦门绸布业的零售额一般在350万元(折合人民币,下同)左右,其中过往华侨的消费约在100万元左右,占28.57%。据调查,绸布是归侨购买的主要商品之一,每位华侨平均购买额约为15美元(按1950年代汇率,折合人民币36元)。如以平常年份华侨每年回国人数3.5万人计,则其消费量约为126万元,约占绸布业全市零售营业额的1/3左右。而据厦门历史上著名的同英布店的帐目,其零售业务60%销给本市,40%销给流动人口。后者的主要构成为出入境华侨。<sup>⑩</sup>无论哪种估算法,都证明了出入厦门口岸的华侨给厦门的绸布消费带来的繁荣。

除了回乡探亲,闽南华侨还因各种原因回国,也都在厦门有许多消费。如当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未婚男子大多有回乡成亲的习惯,他们往往要在厦门采购结婚用品。福建省档案馆的一份题为《胡赞成诉巨款被辛清祥等窃取》的案卷有如下记载:1947年12月间,旅菲华侨胡赞成由友人陪同,携款“计美钞三仟六佰零柒元,菲币壹仟柒佰元”,“往厦预备购办婚礼应用物品”,不幸遭窃……<sup>⑪</sup>笔者在对厦门市郊仙岳村的一次调查中,也获悉一位叶姓老华侨于1948年春返厦时,为给其谊子办婚事,就花了数千美元。<sup>⑫</sup>上述二例说明,华侨回乡办婚事之类的消费,也对厦门的消费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刺激和促进。

## 二、华侨在民国时期厦门工商业活动中的作用

华侨在厦门工商业活动中的作用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作用指华侨以资金投入厦门工商业,其投资行为直接在社会经济中产生效用。间接作用指华侨虽未直接投资,但其消费行为或其它活动间接引起社会经济的变化。本文所谓的工商业活动是广义的,包括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因为商业性投资占房地产投资的很大比例,而房屋的建造与房地产的交易也属

工商业活动的范围；金融业则构成近现代工商业活动的基础，二者密不可分。

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场所主要在城市。根据 1958 年的调查，1875—1949 年间，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占福建省的 62.88%，占全国的 12.49%。“如果以城市为单位来比较，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列第一位的，可见它在福建以及全国的投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其中，1875—1919 年间的投资额仅占这 74 年总投资的 9.49%，所以绝大部分投资是在民国期间进行的，尤其是在 1927—37 年的投资高潮期，其投资额占 74 年总额的 60.97%。<sup>⑬</sup>

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的行业分布按其金额多寡依次为：房地产、商业、工业、金融、交通和服务业，各行业投资金额与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1875—1949 年华侨在厦门投资行业分布表(单位：折合人民币元)

行 业	投 资 金 额	比 例
房 地 产	57 025 000	65.17%
商 业	11 500 000	13.14%
工 业	11 050 000	12.62%
金 融	5 800 000	6.62%
交 通	1 600 000	1.84%
服 务 业	510 000	0.58%

资料来源：林金枝《近代华侨在厦门投资概况及其作用》，《厦门文史资料》第 11 辑。

房地产业在民国时期华侨发挥作用的厦门各行业中可谓成绩最显著者，华侨的投资实乃近代厦门城市形成的最大推动力。诚如 1937 年 4 月《厦门市政府公报》第 24 期所言，“查厦岛自开辟马路，改良新市区，旅外华侨不惜以多年勤劳累积之金钱，返回投资，重金购买地皮，建筑新式房屋，繁荣市区……如非华侨热心桑梓，踊跃投资，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sup>⑭</sup>根据 1958 年的调查，整个厦门房地产业有 60—70% 是华侨投资的。1930 年代，厦门有私人楼房一万多座，属于华侨所有的即有五千多座。<sup>⑮</sup>如果再加上华侨投资建成后出售的楼房，其数量就更多了。华侨投资的房地产业，除了大型公共工程如码头、道路、公园、市场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自住房屋，其次是用于出租或出售，再次是作为娱乐场所或服务设施。福建省档案馆有一份题为《各属侨胞在厦业产被占情况》的案卷，很能说明问题，现据该案卷中资料列表于下：

1946 年 11 月厦门市海外华侨协会报告华侨房产被占情况表

序号	侨胞姓名	侨居地	所拥有楼房的座落	座数
1	郑妈士	菲律宾	大同路 419 号	1
2	侯金庆	菲律宾	民国路 108 号	1
3	洪耘年	菲律宾	思明西路 37 号	1
4	欧阳厥祥	荷属东印度	小走马路武当分镇 28 号	1
5	雷藻源	法属印支	晨光路 49 号	1
6	刘育才	荷属东印度	镇邦路 74 号	1
7	何水镛	荷属东印度	思明东路 110 号	1

8	许经撇	未详	后厅衙巷 17、19 号	2
9	许志北	菲律宾	打铁街 157 号	1
10	曾国聪等	荷属东印度	思明戏院	1
11	林淑董	英属马来亚	思明南路 327、329、331 号	3
12	林淑董	英属马来亚	中山路 119 号	1
13	曾江水	英属马来亚	海后路 42 号	1
14	林朝茂等	英属马来亚	思明南路、鹭江道、开禾路、典宝街等处	18

资料来源:《(民国)福建省政府秘书处档案》, 全宗号 1, 目录号 6, 案卷号 1860。

表中所列各项, 第 10 项为娱乐场所, 第 8、11、14 项有可能出租, 其余各项既可能自住也可能出租。可见华侨所投资的房地产业, 除满足自己及眷属所需外, 还有其它各种用途, 为活跃厦门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出了贡献。此外, 表中所示华侨房屋的座落, 遍及今厦门老市区各处; 侨胞的由来, 则遍布东南亚各主要侨居地。这两点均可说明华侨参与房地产业的广度。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侨房出租在厦门是非常普遍的, 这不仅活跃了房地产市场本身, 而且带动了商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笔者在菲律宾对闽南籍华侨华人的调查显示, 这些人中有相当多在厦门置业, 其主要用途之一便是出租取利。如旅菲侨商林云梯、林珠光父子名下的楼房就有 48 座, 近年落实侨房政策即归还林氏家族 17 座房子, 其中位于大同路的 10 座, 位于镇邦路的 3 座, 还有其它街区的, 这些楼房在 1949 年以前大多是出租与人作各种用途。<sup>⑩</sup>

商业在民国时期华侨发挥作用的厦门各行业中仅次于房地产业。据 1931 年的调调, 厦门城区的商店共有 10718 家, 而当时的城区面积仅为 1 平方公里左右,<sup>⑪</sup>其密集程度不可谓不高。又据 1933 年的调查, 厦门城区(不包括鼓浪屿与禾山区)的从业人口共计 56371 人, 其中商业 9215 人; 店伙 15012 人,<sup>⑫</sup>分别占 16.35% 和 26.63%, 分列第二位和第一位。换言之, 当时厦门城区的从业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属于商业领域的。上述数字凸显出了在厦门这样一个不大的城市中商业占有的地位。《1931—1933 年厦门商业概况》报告说:“促成厦门商业如此兴盛的, 的确是华侨的力量。”<sup>⑬</sup>前文所述侨眷将侨汇用于生活消费, 以及出入国华侨的各种消费, 已从消费的角度论及了华侨对厦门商业的间接促进作用。以下再简要谈谈华侨对厦门商业的直接促进作用。

据《厦门华侨志》的资料, 1913—35 年间 36 家华侨投资(独资)的商业企业中, 投资金额最多者为 20 万银元, 最少者为 2 万银元; 涉及的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医药、百货、茶叶、家具、布业、粮食等; 投资人来自缅甸、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地。<sup>⑭</sup>可见此间华侨投资的商业企业虽然规模一般不大, 但于国计民生都是必需的。华侨企业在各行业中的比重及其与非华侨企业相比的情况, 以布业为例, 1949 年以前厦门市华侨资本的绸布商共计 18 家(批发、零售各 9 家), 占全市绸布商家总户数的 16.6%; 华侨资本的绸布店投资总额为 345239 元(折合人民币), 占全市绸布店投资总额的 18.2%。<sup>⑮</sup>华侨企业在投资额上所占的比重, 大于其在商家户数上所占的比重, 可见其资本一般较非华侨企业雄厚。

工业在民国时期华侨发挥作用的厦门各行业中又次于商业。由于民国时期的厦门是典型的商业消费城市, 所以工业在这一时期厦门经济生活中地位并不高。但就工业本身而言, “厦门工厂大多为华侨投资”,<sup>⑯</sup>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 华侨和侨眷的消费需求, 也是刺激厦

门的工业与手工业多少有所发展的一个动力。1937年8月5日和6日连载于厦门《江声报》的一篇题为《厦市手工业概况》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就很典型地说明了厦门的工业、手工业与南洋华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现摘引如下：

绒拖(鞋)一物发明于菲律宾，体式新颖，为暑天吾人之必需品。是故侨胞每次回国，时有购置，于是尽人皆知，多乐穿之，尤以妇女特别欢迎。因之本市百货店，即群向青岛厂家贩运来厦出售。迨至民国十年间，始有致中和来厦创设分行于开元路，专营绒拖。……至民国十二年间，复有活源之设。……致中和及活源等，后乃创设工场，召工在厦自行制造。出品式样，与菲产无异，其产品种类有珠面、绒面、绒四条带、皮四条带等，且珠面之绣花莫不日新月异，争奇斗艳，以迎合顾客采择之心理。日后营是业者，如雨后天春笋，计有福泉益、协晋、金山、图南、福建硝皮厂、福泉春、永和昌等相继开设。今年来复有坤记、永川、协源等之开业。……<sup>②</sup>

这当中既有华侨和侨眷的消费对该行业的刺激作用，亦即间接的作用，也有华侨投资对该行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亦即直接的作用。而该行业在厦门的出现和发展，完全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华侨厂商在菲律宾经营绒拖鞋的产销，当发现了国内市场之后，复又投资于厦门，这种回国投资于同行业的情况，与华侨回国进行跨行业投资相比，其收益当会更快一些。这种情况也并非仅限于绒拖鞋业。下面再举一例，以说明同行业投资并非个别情况。1946年1月，菲律宾华侨施维熊倡议筹资组织华侨烟草公司，行址设于厦门，“得各热心菲侨认股筹备完竣，乃于本年二月间将一切制烟机械原料购备，连同所向菲律宾岷市大成烟叶公司采办之烟叶一千捆待船运来。……”后因烟叶进口在海关受阻，施维熊特申诉于福建省主席，省政府很快批复准予进口，解决了其开业问题。<sup>③</sup>从现存的档案材料可以判明，入股设于厦门的华侨烟草公司的菲律宾华侨厂商中，有一些原本就是经营烟草业的，故亦可将其归之于同行业投资。

金融业在华侨发挥作用的各行业中虽然排在房地产、商业和工业之后，但侨资银行在厦门银行业中的地位并非不重要。1934年开设于厦门的10家本国银行中，有3家为侨资银行；1家为国内与华侨合资的银行。3家侨资银行的情况依次为：

中南银行，是闽南资本家黄奕住所创办，总行设在上海，资本金750万元。厦门设分行，鼓浪屿设有办事处，有发行纸币权，兑换券通行甚广，仅次于中国银行。中兴银行，总行设于美属菲律宾首府岷里刺，实收资本1140余万元。美汇情形，比较熟悉，外商银行以外，押汇此行最多。华侨银行，总行设新加坡，资本1000万余元。从(民国)21年1月1日起已宣布和资本2000万余元的华商、资本800万余元的和丰银行合并。华侨银行是有限公司，是南洋华侨金融的总汇机关。<sup>④</sup>

另有一家“本地人和侨商所组织”的厦门商业银行，资本60万元，在上海设有分行，“对于各种储蓄，也颇致力，和钱庄业往来不少”。<sup>⑤</sup>上述几家银行在厦门的国内外贸易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民国时期汇入福建的侨汇绝大部分是在厦门结转的，因此厦门的侨批业也十分发达，而侨批业亦属广义上的金融业。在《厦门侨批业简史》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20世纪以后侨汇迅速增加，据估计，1905—1919年间，厦门承转侨汇(包括当地解付部分)一般保持在1800万银元(下同)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洋经济

逐渐恢复,华侨出国人数也增多,1921年侨汇激增至4400多万元,1928—1931年间,银价大幅度下跌,有利华侨汇款回国,又值厦门大兴建设,华侨竞相汇款投资房地产开发与其他工商业,侨汇节节上升。1932年高达9000多万元。厦门是闽南经济金融中心,是华侨出入口岸和国际邮递口岸,闽南侨汇承转局均设在厦门,1936年登记营业的头二盘承转局达84家。<sup>27</sup>

侨汇在厦门的资金融通、汇兑及对外贸易中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外汇源源不断地进入厦门,厦门的城市建设和工商业发展将大为逊色,厦门的外贸赤字也将无法得到弥补。由此可见承担侨汇业务的侨批业之重要性。

民国时期厦门海陆交通的发展,华侨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仅举二例于下。其一是1926年马来亚华侨黄晴辉发起投资兴办厦门岛美仁宫至江头的公路客运,之后又成立了全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一些禾山籍华侨为便利地方交通、本乡里繁荣和自己的利益,都乐于认股和投资”。在随后进行的公路续建和新建中,华侨亦大力出资,其中大桥头至曾厝安全线的筑路费由马来亚华侨曾国办独力出资;莲坂至何厝线、江头至寨上线由菲律宾华侨林云梯和马来亚华侨陈有才出资协助修建。<sup>28</sup>其二是1925年华侨王鼎坤等集资24万银元创办泰利轮船公司,先后购置“鹭江”、“驾鳌”、“永宁”、“捷安”等轮船川走温州、汕头、涵江、泉州和香港,依靠地方势力,开拓新航线,业务发展很快,获得巨利。<sup>29</sup>

民国时期厦门服务业的发展,既得益于华侨的投资建设,又得益于华侨出入国的消费刺激。厦门的娱乐服务设施大都是华侨出资兴建的,如思明戏院、中华戏院、鼓浪屿戏院、新世界娱乐场等。<sup>30</sup>而厦门的旅店和客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华侨出入国而兴起的,这些旅店、客栈有许多是闽南各侨乡的人在厦门开办的,而且主要是为本乡的华侨出入国服务的。其服务不可谓不周到,旅客吃、住均可赊帐,店主还代旅客购买车、船票,甚至代办出国手续。<sup>31</sup>

综上所述,在民国时期厦门的工商业活动中,华侨这一因素实为重要的甚或主要的促进因素。实际上,华侨的作用尚不止这些,还可以列举其它行业的情况。如远洋航运,戴一峰的《闽南海外移民与厦门兴衰》一文就详尽论述了华侨出入国带动下的厦门远洋航运业的发展。<sup>32</sup>因篇幅关系,本文不再赘述。

### 三、对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之综合评价

民国时期厦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经济生活诸领域受华侨这一因素的影响是至为明显的。华侨对上述诸领域所发生的作用,以消费领域最大,流通领域次之,生产领域最小。其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厦门成为一个消费型商业城市。1905—1926年间,厦门的华侨投资总数仅占其华侨汇款总数的1.86%;1927—1938年间投资总数也只占侨汇总数的3.41%。<sup>33</sup>厦门本岛缺乏资源,其经济腹地闽南交通不便,市场狭小,因而妨碍了华侨对厦门的生产性投资,进而使华侨的影响偏重于流通与消费。

从时间上来说,民国时期华侨对厦门经济生活发生最大作用的时段是在1927—1937年间。1927年以前华侨的影响不如自1927年始的那10年,1938—1945年间厦门沦陷时期,华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是处于低潮。1946—1949年间华侨的影响虽又上升,但为时甚短,且不稳定。从空间上来说,民国时期华侨对厦门城市经济所发生的作用大于农村经济,而这一

时期厦门的市区只占了本岛面积的很小部分。虽然厦门籍的华侨主要来自于禾山区，亦即当时的乡村地区，但是他们在家乡除了建房置地外，很少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据笔者调查，菲律宾华侨叶朝君于1931年在其祖籍地禾山区后坑村投资兴办的侯卿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华侨投资农业生产的例子之一。<sup>③4</sup>

从华侨资金的来源来说，除了用于生活消费的侨汇之外，投资于厦门的华侨资金主要来自非厦门籍的华侨。如最大的房地产及城市建设投资者之一、菲律宾华侨李岷兴、李清泉父子祖籍为晋江；最大的金融业投资者之一、印尼华侨黄奕住祖籍为南安；最大的食品工业企业陶化大同公司的投资者、马来亚华侨杨格非祖籍为同安。厦门籍华侨在本岛的投资因而相形见绌。据笔者调查，厦门籍华侨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为菲律宾宿务市，而厦门的华侨投资却鲜有来自该市者。<sup>③5</sup>

作为厦门经济腹地的闽南，虽然无法对厦门的发展起较大的推进作用，但因其为福建的主要侨乡，而由于民国时期乡里不靖，时有匪患，故闽南籍华侨和侨眷都视厦门为国内最佳的落脚点，大量游资随之聚集于厦门，使厦门经济受益于此。从近代华侨投资在福建的分布来看，厦门占了全省的62.88%，几近全省的2/3。<sup>③6</sup>这一点可部分地解释非厦门籍华侨投资在厦门侨资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

作为近代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是五口中唯一的海岛城市，经济规模小，历史也很短，然而却成了华侨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最突出的城市，实乃天时地利人和使然。不过人们因此也不能就华侨对厦门经济的影响作过高的评价，而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局限之所在。

#### 注释：

- ①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② 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2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 ③ 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等：《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400页，鹭江出版社，1990年。
- ④ 厦门市档案局等：《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63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 ⑤ 调查时间为1991年11月至1992年2月。12个自然村是：后坑、祥店、寨上、高林、钟宅、仙岳、莲坂、吕厝、殿前、何厝、前埔、岭兜。银元与美元的比价，据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43—444页）。
- ⑥ 同注④，633页。
- ⑦ 章振乾等：《福建主要侨区农村经济探论》，《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
- ⑧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10—11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
- ⑨ 厦门市政协文史委等：《厦门工商史事》82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
- ⑩ 同注⑧，82—83页。
- ⑪（民国）福建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6，案卷号1784。
- ⑫ 采访叶建文、叶建智谈话记录》，1992年1月21日，厦门市仙岳村。
- ⑬ 同注④，628页。
- ⑭ 同注④，638页。
- ⑮ 同注④。
- ⑯ 采访林聚彪谈话记录》，1993年2月26日，菲律宾马尼拉市。
- ⑰ 同注④，83页；119页。
- ⑱ 同注④，647页。

- ① 同注④, 83 页。
- ② 本书编委会:《厦门华侨志》160—164 页, 鹭江出版社, 1991 年。
- ③ 同注⑨, 81 页。
- ④ 同注④, 34 页。
- ⑤ 同注④, 6 页。
- ⑥ 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824—825 页, 档案出版社, 1990 年。
- ⑦ 同注④, 320 页。
- ⑧ 同注④, 320 页。
- ⑨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闽南侨批业史记述》38 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 ⑩ 同注⑨, 111—112 页。
- ⑪ 陈逢源:《近代厦门港口的航运》,《厦门文史资料》第 17 辑。
- ⑫ 同注⑩, 207—208 页。
- ⑬《采访杜金枝、陈文辉、刘浩然谈话记录》, 1991 年 12 月 21 日, 泉州市。
- ⑭ 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 年 6 月号, 49—51 页。
- ⑮ 同注④, 634 页。
- ⑯ 见《湖里文史资料》第 2 辑, 65—67 页。
- ⑰ 据笔者 1993 年 1 月在菲律宾宿务市对厦门籍华侨华人的采访记录。
- ⑱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38 页,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作者陈衍德,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邮编: 361005。